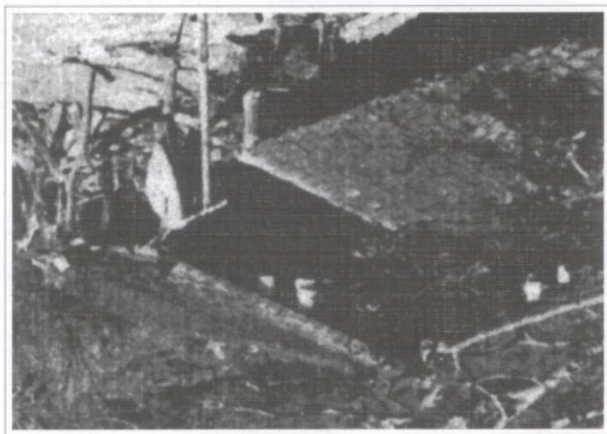


SOUTH - 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 R. CHINA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SOUTH 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ISBN 7-5367-1917-5



9 787536 719170 >

ISBN7 - 5367 - 1917 - 5

G · 335 定价: 18.50 元

SOUTH – WEST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INSTITUTE OF HISTORY,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P. R. CHINA**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序

何耀华^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的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的日益现代化是巨变的中心，而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习俗、艺术与娱乐等等）的急速变迁，则是巨变在精神领域中的表现。

在文化变迁中，学习西方优秀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共识。但是，对孰是西方的优秀文化的问题，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答案只有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按照小平同志在此提出的思想和标准，判断什么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西方优秀文化，那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应该怎样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必须以弘扬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若不是这样，中国文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失去立足之地，更谈不上与西方文化争短长。因

^① 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此，反对摈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西化”，过去是，今天是，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未来文化的取向。在这个宝库中，有许许多多有益于再创中国文化辉煌和世界文化辉煌的因素。以“修身立己为本”的因素来说吧，在《礼记·儒行篇》中，曾对作为人格的理想化模式，即做一个理想化的人作出规范，提出“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推贤而进，不望其报”、“慕贤而容众”、“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先劳而后禄”、“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程功积事，推贤而进之”等等的主张，这些规范自秦汉以来久兴不衰，而且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诸如此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宝库中的蕴藏是极为丰厚的，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它们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的基础之上。其次是撷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使它的独特性质更加得到发扬光大。只有这样，21 世纪的中国文化才能独树一帜，才能超越西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西南居住着 34 个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它们各自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中国西南地域辽阔，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地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新的创造，包含着对各兄弟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地地方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和创新。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出版，就在于要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为开拓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因此，《中国西南文化研究》应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作为构建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文化的根本取向，并给撷取西方优秀文化以正确的导向。

目 录

论中法战争的历史经验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 龙永行 (1)

西亚文化与藏彝走廊民族的迁徙..... 申 旭 (19)

外来宗教对西南苗区的影响..... 颜恩泉 (45)

傣族民俗文化论..... 王懿之 (67)

云南民族饮食习俗与文化积淀..... 蒋文中 (93)

云南民族饮食传统和特色..... 刘云河 (119)

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的发现与认识..... 侯 冲 (148)

云南历史民族文化名人资源研究..... 谢本书 (165)

朱德与云南的民主革命..... 汤明珠 (184)

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交通..... 牛鸿宾 (199)

宋朝四川地区交通简述..... 李桂英 (216)

SOME SIMILARITIES OF TRADITIONAL

SOUTHEAST ASIAN HOUSE ON STILTS

..... Arch Doan Bacu (VIETNAM) (228)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评介 文艺蓓 (240)

论中法战争的历史经验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龙永行

1883—1885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到现在已经过去110多年了。这次战争，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中国，中越两国人民为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它是中国和云南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法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变越南为殖民地，进而侵入中国，掠夺云南丰富的矿藏资源。在战争中，云南是援越抗法的前线，由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数万名滇军将士开赴北圻，在宣光包围战和临洮大捷中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战后，英、法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云南，蒙自、思茅等地相继辟为商埠，滇越铁路的修筑，七府矿权的丧失，云南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地位日益加深。这次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全国有将近一半的省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清政府直接投入闽、浙、滇、桂战场的兵力不下20万，用于军事开支的费用也有2,000—3,000万两之巨（其中一半是借用外债）。军事方面，中国军队取得了近代史上少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结果，由于列强的干预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越南脱离中国的藩属，成了法国的殖民地。这次战争，中国虽然由胜利而转为失败，但中国人民直接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越南抗击法国的侵略，保卫了祖国的神圣南疆，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毋庸置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英雄儿女，在战争中表现的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

篇章，是我们今天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题材，这对新时期两个文明的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同时，这次战争，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1870年普法战争后，法国为了补偿战争的损失，便加紧在远东地区的侵略，先后占领越南南圻和中圻，并向北圻扩张。越南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救。清政府鉴于“唇亡齿寒”，决定从广西、云南两路派兵援越，抵抗法国的侵略。1883年12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兵6,000人，带了两百多门大炮，向山西进犯。驻守山西的唐炯和驻守北宁的徐延旭由于接到清政府“第不可衅自我开”的命令，毫无布置，致使山西、北宁相继沦入敌手。1884年6月，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卖国屈辱的《中法简明条约》，不久，又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又主动挑起观音桥事件。清政府乞怜于英、德政府进行调停，最后和谈宣告破产。

1884年8月5日，法国海军侵犯我国基隆。台湾巡抚刘铭传率领将士，奋勇地抵抗了法寇的入侵，将他们全部逐回海上。8月23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在马尾袭击中国福建水师，击沉击伤我方战舰11艘，伤亡清军2,000余人。中国广大的中下级官兵，临危不惧，英勇地回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

马尾战后，清政府正式宣布对法作战。西线滇军统帅岑毓英，奉令率5万名将士进驻北圻。1884年12月，岑联合桂军、黑旗军，主动进攻法军，包围宣光城70余日，使城中法军不得不用玻璃瓶装书信，投入红河，向河内告急。与此同时，东线潘鼎新却畏敌如虎，不战自逃，致使谅山、镇南关相继失陷。白

族将领杨玉科英勇杀敌，为国捐躯。法军东线得手后，回师增援西线，解了宣光之围。

镇南关失陷后，老将冯子材在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挑起了抗敌重任。1885年3月23日，冯子材于镇南关大败法军，杀死敌军1,000余名，接着又连克文渊、谅山等地。西线的滇军也在此时发起全面反攻，3月23日临洮一战，取得了歼敌2,000余名的辉煌胜利。临洮大捷后，滇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不拔、广威、永祥等十余个州县。云南开化府地区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也在猛洞苗族首领项从周的领导下，用大刀、长矛、弓弩、火槌等原始武器，经过扣林、船头、新寨、马跌坎等大小数十次战斗，终于打败了法国侵略军，收复了滇东南的失土。大体在此同时，我国江浙沿海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坚决地抗击了法军的入侵，保卫住了东南沿海的门户——镇海。这一系列的胜利，给了法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最后导致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腐朽卖国的清政府却把这些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命令前线停战撤兵。她在列强的干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和金登干的操纵调停下，与敌言和了。1885年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同年6月9日，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货进出云南、广西边境时，应减轻税率；日后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法国从澎湖、基隆撤军。条约完全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中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中法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了我们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重要的启示。它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因而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出现了新的觉

醒和一线生机。总结起来，这些经验和启示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全民奋起，团结战斗，是战胜敌人，取得反侵略斗争最后胜利的必要前提。

中法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法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进行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对中国来说，战争的正义性是不言自明的。一般来说，正义的战争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而也就有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战争的胜败，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所组成，并非因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而决定，因为，事实上，往往正义的战争并不都会胜利，这已经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了。而要取得正义战争的彻底胜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还必须全民奋起，团结一致，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从而才有使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下面，我们从中法战争中两次完全不同结果的战例分析，来说明团结问题的重要性。一次是 1883 年底至 1884 年初的山西、北宁之战，另一次是 1884 年底至 1885 年初的宣光之战。

山西、北宁之战爆发于中法战争的初期。当时清政府中的决策人物，如慈禧、李鸿章、奕訢等人，掌握着军政大权，奉行卖国投降的政策，他们害怕帝国主义，更怕本国人民，因而不敢发动和组织人民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在强敌压境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兵进驻北圻，但又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而是严令清军“第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未可显露作战之迹，致启衅端。”^① 这种若即若离、似打非打的指令，严重地束缚了前线将士的手脚，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同主和派相左的是一些主战派官员，虽然他们也主张对敌一战，但由于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第 3、27 页。

没有多大实权，同样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因而也没有多大作为。主战、主和两派一直争论不休，未能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政府中高级官员的不团结，又影响到军队的不团结。清军的将领中，派系分明，互相倾轧，明争暗斗，形同水火。如陆军中李鸿章的淮系和左宗棠、曾国荃的湘系之间，海军中的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在战争中各自为着保存实力，坐视不救，因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1883年12月山西之战爆发后，双方的军事实力是：驻守越南北圻的西线滇军（驻山西）有5千人，东线桂军（驻北宁）有30余营，近2万人；法军方面有9千余人。从数量来说，我为敌之两倍，占有较大的优势。从武器装备来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以后，清军已拥有部分先进武器，虽然与法国侵略军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法国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政治和道义上不得人心，加之兵员不足，战线过长，远涉重洋，运输补给困难等不利条件，中国军队如坚定抗战，精诚团结，彼此支援配合，东西两线组成强大有效的钳形攻势，那么，战事之初，就可能遏止法帝的侵略，把敌人消灭于国门之外。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与此相反，清军丢失了两个战略要地。

造成山西、北宁失利的原因，一方面除东、西两线主将昏庸无能，坚决执行清政府的失败路线外，另一方面也是清军互不声援配合所致。如负责西线防务的主将、云南巡抚唐炯就公开厌战，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战则兵连祸结”，^①因而敌军未到，便撤走原驻山西之滇军，“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后来，当山西战场吃紧之际，本来与滇军“互为犄角”、“联络声势”的桂军，在统领黄桂兰、赵沃的带领下，虽经滇军几次紧急求援，仍“坐视山西之失，拥众不救，所称拨

① 《中法战争》（二），第230—231页。

助刘军新靖四营归唐景崧统带者，实则任意扣留，握兵自卫而已。”^① 这种临战观望、坐视不救的恶劣作风，是造成山西失守，继之北宁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山西、北宁的失利是清军腐败、将士不能团结合作的话，那么，1884年底到1885年的宣光之战，便是滇军、桂军和黑旗军团结战斗，夺得胜利的一曲凯歌了。

宣光之战，是云南提督何秀林、总兵丁槐率领的滇军，与唐景崧率领的广东景字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三支友军，通力合作，和衷共济，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取得的仅次于镇南关之役的光辉战例。在协调三支军队的关系中，唐景崧发挥了维系三方纽带的作用。首先，他利用过去与黑旗军一段亲密合作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了黑旗军内部刘永福与黄守忠之间的矛盾。

另外，唐在战前，还努力调停了滇军总兵丁槐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之间的矛盾。1884年11月初，唐和丁槐去渊亭（刘永福）营中商议军事。丁、刘相见，就勾起了过去他们间的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丁颇折节渊亭，而渊亭冷落不为礼”，两家“怨毒若不可解”，“实有不能并处之势”。^② 最后，唐陈书前军主帅、云贵总督岑毓英，言：“六不可”，并经过三方协商，确定唐、丁负责攻城，刘任堵河打援的作战方针。丁、刘虽有矛盾，但在宣光大战开始之前，并由于唐景崧的巧妙斡旋调停，因而使得他们的矛盾没有进一步演变激化；在作战部署上，又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冲突，使他们的成见暂时放在一边，集中主要的精力去对付共同的凶恶的敌人。以后，岑毓英又派提督何秀林带领3千6百人驻守左旭，协助刘永福截击增援宣光之敌；何与刘曾经有过较好的交谊，因此两人能同心协力，共同破敌。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31页。

② 《中法战争》（二），第162页。

再次，在战斗中，三军协同，团结互助。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初五日，宣光的法军出城攻击黑旗军的吴凤典营，吴营新壁未坚，正在危急。唐景崧的景军，何秀林的滇军，以及黑旗军闻警驰救，“三路合击，自辰至未，毙敌甚众，乘胜逐至城下”。^①这一仗是清军第一次在军事行动上支援刘永福。所以唐景崧十分得意他说：“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袍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应援耳。”^②景军、滇军包围了宣光后，两军互相支援，大力协同，丁、唐二将经常在一起商讨军机大事，共同指挥清军。经过浴血奋战，清军夺取了法军的城外炮台。在夺敌炮台中，粤军最初采取硬攻，不利；后滇军总兵丁槐建议用“滚草法”破敌。两军分工合作，由滇军挖壕，粤军缚草，草压炮台，遂将城外敌之炮台、营寨全部夺取。法军的外围据点被拔除后，城中守敌势孤，两军又联合采取挖掘地道、地雷轰击、滚草夜袭等战术，多次向城内敌军发动猛烈的进攻，仅十二月十一日之战，就击毙法军军官五画一人，四画一人，一画二人，法军士兵及仆从军数百人。清军将士英勇作战，“前者伤亡，后者继进，裹创血战，雨夜不休，望见城内之贼，纷纷倒毙”，“城中樵汲已断，粮亦垂尽，教匪大半窜逸，贼势危蹙，伏匿待毙。”“法自入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③宣光“势在垂危，不日将陷”，被围法军不得不以竹筒、玻璃瓶装书，投入红河，向河内之法军求救。负责打援的黑旗军，也积极配合攻城之滇军和景军，他们截获敌之求救书信后，将计就计，于左旭埋下火药两万斤，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河

① 《中法战争》（二），第160页。

② 《中法战争》（二），第161页。

③ 《中法战争》（二），第202页。

内援军五百余人，获得了“千百战斗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胜捷”。^① 无论担任攻城的滇军、粤军，还是负责打援的黑旗军，在宣光之战中，都干得很出色。他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打得十分勇猛顽强，甚至敌人也不得不“盛称宣光华军力战甚勇，攻围有法。游击茂连拿厘伤毙，再过七日，则城内无一生者”；说左旭之战，“则言法攻东京以援宣一役为最难，黑旗勇敢无匹……法人守城与援宣之兵受创过甚，力敝气沮，故仅解宣光之围，不能上犯馆司，其震怖之情，露于楮墨，至今法人犹深畏忌”^②

通过山西、北宁及宣光之战一负一正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弱国在对付强国，落后国家在对付先进国家的战争中，举国上下一致的团结，是战胜强敌的首要条件。事实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斗争就能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法战争的另一个侧面——云南文山地区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斗争的胜利来加以说明。

19世纪80年代，法国吞并越南南方，扩张至北圻，并进而侵入我国云南的马关、麻栗坡地区，用武力强占了安平厅的大片土地。不甘屈服的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在猛洞苗族首领项从周的领导下，用大刀、长矛、弩箭、竹签、火槌等原始武器，同拥有洋枪、洋炮的1千多名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经过数十百战，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把法帝国主义逐出了我国的领土，在近代史上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时，项从周的队伍不过2、3百人，活动范围也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加之清政府不仅不支援，反而袖手旁观，甚至要把猛洞、船头一带拱手送给法人。在这样十

① 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第157页。

② 《中法战争》（二），第203页。

分不利的形势下，项从周团结了各族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多次粉碎了法寇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进攻，最后打败了法帝国主义，收复了我国的神圣南疆，并把它无私地交给了中国政府。这同拥有百万清军，无论在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的清政府，恰是个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是列宁所说的：“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①

总的来说，中法双方在战争中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侵略我正义。敌强我弱，对我来说是个不利因素，对敌来说则是他们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战争初期敌之进攻和我之防御；但其他因素却于我有利，特别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我之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是能够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清政府的当权派，如慈禧、李鸿章之流，是卖国投降的代表人物，也是战争的失败主义者。他们片面强调敌强我弱因素，故意夸大法国“船坚炮利”的物质条件，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战则必败”，说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②

应该说，敌强我弱的形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敌强我弱是可以改变的，彼此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战争中，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如何，特别是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一切弱国、小国战胜强国、大国侵略的主要精神支柱，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变不利为有利，克服物质、装备等困难，最后战胜敌人，去夺取斗争的彻底胜利。可以说，这是一切小国、弱国反抗侵略的特点和优点，是强大的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突出优势。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02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第23页。

毛泽东曾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

中法战争的经验也证明，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战胜强敌的重要保证。如 1885 年春，法寇攻陷、焚毁了镇南关，并在关上写上“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挑衅标语时，全国人民眼看侵略者把战火烧进我国的南大门，无不义愤填膺。这时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冯子材，毅然挑起前敌主帅的重任。他动员大家说：“法国鬼打进了镇南关，毁了我门的南大门。大家要以国事为重。国事就是家事，法寇不灭，无国就是无家，大家要同心协力，保卫国家。”^② 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并用“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③ 来激励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在他的号召带动下，清军将士群情激昂，个个奋勇当先，从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实现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钢铁誓言。又如纸桥大捷中，黑旗军管带杨著恩慷慨请战，说：“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④ 战斗中，他表现得十分英勇，两股中弹倒地后仍不肯后退一步，继续坚持战斗。他的右手腕被打断了，就用左手持枪射击，共击毙了十多个敌人，临死前还把法国五画指挥官李威利击毙。再如白族爱国将领杨玉科，在谷松之战中，亲督将士，奋不顾身，往来冲突，后被法寇的炮弹击中坠马，亲兵扶他后退，他坚决不肯，临死还不断鼓励下面将士：“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法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70 页。

②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实录》，第 137 页。

③ 《中法战争》（六），第 455 页。

④ 唐景崧：《请缨日记》。

亦瞑矣！”^①象这样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是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也是他们所最畏惧的。

第二，在一切反侵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除了发挥特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绝对优势外，还应该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其他优势。比如，有利熟悉的地形可以为我所用；敌远我近可以以逸待劳；敌以少兵临大国、临多兵，我就可能在个别的战役中成为内线中的外线，集中优势兵力，去歼灭敌人；敌之所恃为武器较好，火力大，射程远，我则采取近战、夜战等战术，使敌之武器失去优势；等等。如此，战争之初，可能因敌强我弱而使敌的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和外线作战的形势，逐步变成战略的防御、持久待援和内线作战的形势。我则恰恰相反。其结果，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就会逐步发生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相互优劣条件也可由敌的强者、优势，逐步变为弱者、劣势；我则由弱者、劣势，逐步变成强者、优势。

在如何扬长避短，正确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中法战争时期的清军将领鲍超说过一段颇有见解的话，他说：“在法夷所恃者枪炮，奴才所恃者队伍。枪炮为呆物，队伍为活人。若专赖枪炮与之决胜负，实攻其所长，即胜亦伤夷无多。奴才虽不能不用枪炮，决不专赖枪炮，徒为遥相轰击，必率队直入夷阵，短兵相交，四面兜剿，尽戮之而绝其根株。”^②鲍超的话，是就一次战斗、一个战役而讲的；而这些战斗、战役的胜利积累，必然会带来战略上的巨大变化。

中法战争的进程也说明这个变化。战争之初，敌人在军事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连陷山西、北宁，清军处于守势。然而在经过一段相持之后，法军的弱点逐渐暴露：由于战线过长和战争的

① 杨汝翼：《杨武愨公讨法夷死事节略》。

② 《中法战争》（六），第468页。